

译者的 尴尬

傅雷等著
郭凤岭编

Translator's Dilemma

忠贞抑或背叛，都无法回避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尴尬：
是坚守孤独与清贫，还是一同媚俗和狂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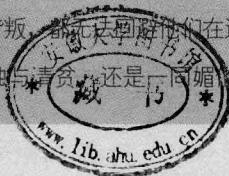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译者的 尴尬

傅雷等著
郭凤岭编

Translator's Dilemma

忠贞抑或背叛，是无法回避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尴尬：
是坚守孤独与清贫，还是同媚俗和狂欢？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译者的尴尬/傅雷等著; 郭凤岭编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-7-5155-0746-0

I. ①译… II. ①傅…②郭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9617号

Copyright©2013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译者的尴尬

作 者 傅雷 等

编 者 郭凤岭

责任编辑 雷燕青

开 本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30千字

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今朝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746-0

定 价 38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编者前言

作为一个不懂外语的编辑，编这样一本书，编者所能做的仅仅是花一些时间把书中文章组合到一起。

当今跟文字打交道的人，有两类人的处境尴尬，一是编者，二是译者。作为编者中的一员，我推己及人，认为译者同编者一样，存在以下尴尬：

首先，在翻译一部书稿时，是做一个忠实者，还是做一个美化者，译者为接受者的考虑到底是不是有效和必要的？

其次，作为当今社会最底层收入者，尤其是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，他们在精神的慰藉与现实的困难面前，将如何确认自身存在的意义？

以及其他诸多问题，最终归于一个形而上的终极追问：翻译是什么？

带着这些问题，编者找到了这些文章，试图以此来诠释翻译者在这一时代的尴尬。

本书编者

2013年4月25日

Contents 目录

- 001 关于翻译的通信 文 / 鲁迅
- 007 “媒婆”与“处女” 文 / 茅盾
- 010 谈翻译 文 / 朱光潜
- 018 翻译笔谈 文 / 李健吾
- 024 翻译经验点滴 文 / 傅雷
- 028 译者、译事 文 / 思果
- 033 我为什么翻译 文 / 草婴
- 038 走上翻译之路 文 / 傅惟慈
- 048 译界的一次盛大笔会 文 / 李平沤
- 051 翻译甘苦谈 文 / 董乐山
- 053 再谈翻译甘苦(外一篇)
- 055 王永年：翻译是为了谋生 文 / 吴虹飞
- 064 学翻译、做翻译、教翻译 文 / 周国珍
- 071 译者独憔悴 文 / 余光中
- 073 作者，学者，译者(外一篇)
- 082 一部名作译本的五十年 文 / 智量
- 094 也谈文学翻译批评 文 / 李文俊

- 100 以翻译为业能否谋生？ 文 / 资中筠
- 104 翻译的态度 文 / 蓝英年
- 107 切勿损害大师形象 文 / 艾珉
- 110 翻译为什么重要？ 文 / 伊迪丝·格罗斯曼 译 / 吴万伟
- 121 谁来接这清贫的接力棒 文 / 吕同六
- 126 这儿也少不了爱 文 / 杨武能
- 131 翻译是一种艺术 文 / 杨德友
- 136 当年翻译收益是今天的几十倍 文 / 郑克鲁 陈辉
- 142 翻译漫谈 文 / 欧阳桢
- 149 翻译家当是“猴学人” 文 / 胡允桓 刘晋峰
- 155 翻译的情与爱 文 / 施康强
- 158 翻译家的无限风光(外一篇)
- 162 翻译的失落 文 / 周克希
- 165 深深的怅惘(外一篇)
- 168 略说译者的心态 文 / 郭宏安
- 173 我的翻译人生 文 / 宋德利
- 185 游走在“漂亮”与“贞洁”之间 文 / 林少华

- 198 译者到哪里去了？ 文 / 余中先
- 202 翻译是有限度的 文 / 许钧
- 207 译者的尴尬 文 / 倪梁康
- 216 译路难，为求上青天 文 / 冷杉
- 221 说说这悲摧的翻译事业 文 / 黑马
- 231 给未来的译者 文 / 黄灿然
- 244 漫谈翻译者的工作 文 / 京不特
- 251 谁实为之？ 文 / 缪哲
- 255 翻译和养猪经济效益对比分析 文 / 南桥
- 260 翻译为何（外一篇）
- 266 怎样剥削译者 文 / 孙仲旭
- 268 最好的和最坏的年代 文 / 黄荭
- 273 《百年孤独》译余断想 文 / 范晔
- 278 为了一种可能的翻译？ 文 / 袁筱一
- 285 译者的任务 文 / 国荣

关于翻译的通信

文 / 鲁迅

鲁迅（1881—1936），原名周树人，浙江绍兴人。现代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通晓日文、德文，初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、日本文学作品，后期主要翻译东欧文学、苏联文学中的革命文学作品。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，以“硬译”风格闻名，一生翻译 14 个国家近百位作家 200 多种作品。

敬爱的 J.K.¹ 同志：

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，使我非常高兴。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，使许多人攒眉叹气，甚而至于讲冷话。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，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，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。“强聒不舍”² 虽然是勇壮的行为，但我所奉行的，却是“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”³ 这一句古老话。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，说得耳熟一点，那便是“阴兵”，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。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，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，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，一面却又大发慈悲，说是这样的译本，恐怕大众不懂得。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，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。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，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，回来就摇头皱脸，做出文章，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，怎样忍饥，说得满纸凄凄惨惨。仿佛唯有

1 J.K. 即瞿秋白（1899—1935），江苏常州人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。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，主持召开“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”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。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，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，犯了“左”倾盲动错误。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。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，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。

2 “强聒不舍”语见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强聒不舍者也。”

3 “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”语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
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，工农就都住王宫，吃大菜，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。谁料还是苦，所以俄国不行了，革命不好了，阿呀阿呀了，可恶之极了。对着这样的哭丧脸，你同他说什么呢？假如觉得讨厌，我想，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。

赵老爷评论翻译，拉了严又陵，并且替他叫屈，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。但由我看来，这是冤枉的，严老爷和赵老爷，在实际上，有虎狗之差。极明显的例子，是严又陵为要译书，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，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，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。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，虽然没有什么意义，但他所用的工夫，却从中可以查考。据我所记得，译得最费力，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，是《穆勒名学》和《群己权界论》的一篇作者自序，其次就是这论，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《权界》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。最好懂的自然是《天演论》，桐城气息¹十足，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，摇头晃脑的读起来，真是音调铿锵，使人不自觉其头晕。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²，不禁说是“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”了。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“达”的译法是不对的，所以他不称为“翻译”，而写作“候官严复达旨”³；序例上发了一通“信达雅”之类的议论之后，结末却声明道：“什法师⁴云，‘学我者病’。来者方多，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！”好像他在四十年前，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，早已毛骨悚然一样。仅仅这一点，我就要说，严赵两大师，实有虎狗之差，不能相提并论的。

1 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。清代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，讲义理、考据、词章，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。因为方、姚都是安徽桐城人，所以被称为桐城派。

2 吴汝纶（1840—1903），字挚甫，安徽桐城人，桐城派后期作家。

3 严复关于“达癖”的话，见《天演论·译例言》，原文说：“译文取明深义，故词句之间，时有所偏到（颠倒）附益，不斤斤于字比句次，而意义则不倍（背）本文。题曰达癖，不云笔译，取便发挥，实非正法。什法师有云：‘学我者病。’来者方多，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。”

4 什法师（344—413）即鸠摩罗什法师，我国后秦高僧，佛经翻译家。原籍天竺（古印度），生于西域龟兹国（今新疆库车）。他和弟子八百多人，曾用意译的方法，译出佛经七十四部，共三八四卷。

那么，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？答案是：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，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——尤其是自鸣钟——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，所以算不了“土”人的。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，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，这一序，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，于是有《名学》，有《法意》，有《原富》等等。但他后来的译本，看得“信”比“达雅”都重一些。

他的翻译，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。中国之译佛经，汉末质直，他没有取法。六朝真是“达”而“雅”了，他的《天演论》的模范就在此。唐则以“信”为主，粗粗一看，简直是不能懂的，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。译经的简单的标本，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《大乘起信论》¹，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。

但我想，我们的译书，还不能这样简单，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。将这些大众，粗粗的分起来：甲，有很受了教育的；乙，有略能识字的；丙，有识字无几的。而其中的丙，则在“读者”的范围之外，启发他们是图画，演讲，戏剧，电影的任务，在这里可以不论。但就是甲乙两种，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，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。供给乙的，还不能用翻译，至少是改作，最好还是创作，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，讨好了，读的多就够。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，无论什么，我是至今主张“宁信而不顺”的。自然，这所谓“不顺”，决不是说“跪下”要译作“跪在膝之上”，“天河”要译作“牛奶路”的意思，乃是说，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。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，给读者省些力气呢？这样费解，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？我的答案是：这也是译本。这样的译本，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，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。中国的文或话，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，作文的秘诀，是在避去熟字，删掉虚字，

¹ 《大乘起信论》，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。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，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。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《大乘起信论会译》。

就是好文章，讲话的时候，也时时要辞不达意，这就是话不够用，所以教员讲书，也必须借助于粉笔。这语法的不精密，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，换一句话，就是脑筋有些胡涂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，即使读的时候，滔滔而下，但归根结蒂，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。要医这病，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，装进异样的句法去，古的，外省外府的，外国的，后来便可以据为已有。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。远的例子，如日本，他们的文章里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，和梁启超做《和文汉读法》时代，大不相同；近的例子，就如来信所说，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“罢工”这一个字眼，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，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。

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，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，新的语法在里面，但自然不宜太多，以偶尔遇见，而想一想，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。必须这样，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。

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，现在是不会有的，只有佛教徒的“唵”字，据说是“人人能解”，但可惜又是“解各不同”。就是数学或化学书，里面何尝没有许多“术语”之类，为赵老爷所不懂，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，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。说到翻译文艺，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，我是也主张直译的。我自己的译法，是譬如“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”，虽然不顺，也决不改作“日落山阴”，因为原意以山为主，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。虽然创作，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。一面尽量的输入，一面尽量的消化，吸收，可用的传下去了，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。所以在现在容忍“多少的不顺”，倒并不能算“防守”，其实也还是一种的“进攻”。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，那不错，都是“顺”的，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，其实也还是要顺的，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“不顺”的一个。

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，其中的一部分，将从“不顺”而成为“顺”，有一部分，则因为到底“不顺”而被淘汰，被踢开。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。如来信所举的译例，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

“达”，也可推定并且更“信”，对于译者和读者，都有很大的益处。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，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。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，有种种的译作。

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，我没有细想过，此刻说不出什么来。但就大体看来，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——各处各种的土话——合一，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，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。后一种，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，要它分布较广，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，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，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。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，例如小说中常见的“别闹”、“别说”等类罢，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，我一定解作“另外捣乱”、“另外去说”的意思，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“不要”来得容易了然，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，倘不是万不得已，也应该回避的。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，即使眼熟，也不必尽是采用，例如“林冲笑道：原来，你认得。”和“原来，你认得。——林冲笑着说。”这两条，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，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，听得“耳熟”的。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，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“眼熟”，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，反而好像生疏了。没有办法，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，听闲谈而去其散漫，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，成为四不像的白话。这白话得是活的，活的缘故，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，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。

临末，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。一，我将“……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”译成“较之自己较之别人，还要亲近的人们”，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。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，没有像“甚至于”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，转几个弯，就成为这么拙笨了。二，将“新的……人”的“人”字译成“人类”，那是我的错误，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。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，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，我是看得很清楚的，但当他默想“新的……

人”的时候，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：（一）“人”的原文，日译本是“人间”，德译本是“Mensch”，都是单数，但有时也可作“人们”解；（二）他在目前就想有“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”，希望似乎太奢，太空了。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，是商人的孩子，是智识分子，由此猜测他的战斗，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，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，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，搬往将来，并且成为“人们”——人类了。在你未曾指出之前，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，这是必须对于读者，赶紧声明改正的。

总之，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，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。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，颇经过了不少艰难，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，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，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，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。还有《铁流》，我也很喜欢。这两部小说，虽然粗制，却并非滥造，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，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“美文”，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。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，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，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，至少在后三年内，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，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，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（如巴比塞¹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²的偏见（如辛克莱）的代表作，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，好在那里，坏在那里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，那么，不但读者的见解，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，就是新的创作家，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。

一九三一，十二，二八。

1 巴比塞（H. Barbusse, 1873—1935），法国作家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火线》、《光明》及《斯大林传》等。

2 基督教社会主义，19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。它把基督教的教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，认为只要实行基督教的“博爱”、“互济”等教义，就能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苦难。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里斯和金斯莱等。

“媒婆”与“处女”¹

文 / 茅盾

茅盾（1896—1981），原名沈德鸿，浙江桐乡人。现代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社会活动家。最初以译者身份步入文坛，译介了大量苏俄及一些弱小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。提倡直译，但他的直译更侧重于在译文里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意境，而不是机械的形式对等，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提出“神韵”说。

从前有人说创作是“处女”，翻译不过是“媒婆”，意谓翻译何足道，创作乃可贵耳！

这种比喻是否确当，姑置不论。然而翻译的困难，实在不下于创作，或且难过创作。第一，要翻译一部作品，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；还不够，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；还不够，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，和书中人物一同哭，一同笑。已经这样彻底咀嚼了原作了，于是第二，尚须译者自己具有表达原作风格的一副笔墨。

这第二点，就是翻译之所以真正不易为。例如荷马的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特赛》，现有蒲伯的译本算是顶括括了；然而评者尚谓蒲伯的译文虽有原作的瑰奇绚烂，而没有原作的遒劲质朴；蒲伯的译文失之于柔弱。譬之一女子，婀娜刚健，兼而有之：——这是荷马的原作。可是蒲伯翻了过来，只剩下“婀娜”了！

又如巴尔扎克的“*Contes Drolatiques*”² 是十六世纪法国生活的一幅神奇的图画。巴尔扎克用了惊人的艺术手腕，——惊人的写实主义的

1 原载《文学》第2期第3卷（1934年3月）。

2 巴尔扎克的一部短篇故事集，现通译为《都兰趣话》。——编者

手段，把十六世纪法国的“快乐”的土伦（Touraine）连镇带人发掘了出来，再现于十九世纪欧洲人的眼前。所以要翻译这本书，必须兼懂历史、古代法国方言，乃至考古学等等，而且要懂得的程度高。前世紀七十四年，离巴尔扎克著作那书的时代已有五十年光景了，始有第一个英文译本；这不是潦草的翻译，可是风味够不上，我们读这英译本，并不能“忘记肚里饿”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译者没有巴尔扎克那一副既诙谐而又热蓬蓬而又粗犷的笔墨。

所以真正精妙的翻译，其可宝贵，实不在创作之下；而真正精妙的翻译，其艰难实倍于创作。“处女”固不易得，“媒婆”亦何尝容易做呀！

大凡从事翻译的人，或许和创作家一样，要经过两个阶段。最初是觉得译事易为，译过了几本书，这才辨出滋味来，译事实不易为了。还有，假如原作是一本名著，那么，读第一遍时，每每觉得译起来不难，可是再读一遍，就觉得难了，读过三遍四遍，就不敢下笔翻译。为的是愈精读，愈多领会到原作的好处，自然愈感到译起来不容易。

从前率先鄙薄翻译是“媒婆”而尊创作为“处女”的是郭沫若先生。现在郭先生既已译过许多，并且译过辛克莱的《煤油》、《石炭王》、《屠场》，以及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的一部分，不知郭先生对于做“媒婆”的滋味，实感如何？我们相信郭先生是忠实的学者，此时他当亦自悔前言孟浪了罢？

不过这些是题外闲文了，我们现在要指出来的，就是近两年来，不喜欢翻译好像已经成为一种青年心理。由不喜欢翻译，从而鄙薄从事翻译的人，也成为一种心理。这原因是两方面的：一方面因为社会混乱，青年烦闷，渴求看看讲到自己切身的事；另一方面因为有些译本不免是“说谎的媒婆”，青年们上过一次当，遂尔神经过敏起来，合着一句俗话：“三年前被蛇咬了一口，于今看见草绳还心惊。”

这种神经过敏的状态，应该加以纠正。而纠正之道，还在从事翻

译的人时时刻刻警惕着：莫做说谎的媒婆。

同时，我们以为翻译界方面最好来一个“清理运动”。推荐好的“媒婆”，批评“说谎的媒婆”。因为我们这里固然有些潦草的译本，却也有很多不但不潦草并且好的译本，——这应当给青年们认个清楚。

谈翻译¹

文 / 朱光潜

朱光潜（1897—1986），安徽桐城人。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翻译家。通晓英、法、德语，译有柏拉图《文艺对话集》、黑格尔《美学》、克罗齐《美学原理》、莱辛《拉奥孔》、爱克曼《歌德谈话录》、维柯《新科学》等近300万字的作品，为中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道路。

在现代研究文学，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陷。尽管过去的中国文学如何优美，如果我们坐井观天，以为天下之美尽在此，我们就难免对本国文学也不能尽量了解欣赏。美丑起于比较，比较资料不够，结论就难正确。纯正的文学趣味起于深广的观照，不能见得广，就不能见得深。现在还有一批人盲目地颂扬中国文学，盲目地鄙弃外国文学，这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个大障碍。我们承认中国文学有很多优点，但是不敢承认文学所可有的优点都为中国文学所具备。单拿戏剧小说来说，我们的成长比起西方的实在很幼稚。至于诗，我们也只在短诗方面擅长，长诗根本就没有。再谈到文学研究，没有一个重要的作家的生平有一部详细而精确的传记可参考，没有一部重要作品曾经被人作过有系统的研究和分析，没有一部完整而有见解的文学史，除《文心雕龙》以外，没有一部有哲学观点或科学方法的文学理论书籍。我们以往偏在注疏评点上做功夫，不失之支离破碎，便失之陈腐浅陋。我们需要放宽眼界，多吸收一点新的力量，让我们感发兴起。最好我们学文学的人都能精通一两种外国文，直接阅读外国文

1 选自朱光潜著《谈文学》，1946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。